

在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不斷地為他者生產「新的需要」，迫使他者為自己作出犧牲，使他者處於一種依賴地位。每個人都力求創造出一種支配他者的力量，滿足利己的需要，實現其控制社會的欲望。



文化歷史學家斯圖亞特·霍爾  
二月離世，享年八十二歲。  
(資料圖片)

## 霸權作為解構大眾文化的方式

黃鳳祝

文化歷史學家斯圖亞特·霍爾二月離世，享年八十二歲。他是文化研究的開創者，也是新左派的重要代表，其有關文化、權力、認同和媒體的論述在文化研究領域具有深遠的影響。霍爾認為，文化不應被視為經濟和物質生活的糖衣，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種人為的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歷史的過程。這種解讀文化的範式，強調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忽略了經濟和政治對文化的規範。

霍爾一九三二年出生在牙買加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具有印第安、非洲和英國血統。青少年時代，他飽受種族文化差異的衝擊，支持牙買加的獨立運動。一九五一年，霍爾獲得羅德斯獎學金，到牛津讀書，畢業後留在英國從事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他主編《新左評論》，譯介歐陸的文化理論，一九六四年進入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由此成為文化研究專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但他本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期間，許多西方知識分子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問題。霍爾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感到興趣，但是在文化研究中，他對馬克思主義始終保持批判的態度。霍爾認為，意識形態和文化問題，在馬克思那裏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文化研究領域，霍爾是一個不肯妥協的學者，畢生與馬克思主義爭論不休。

圍繞社會發展決定因素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的起點。馬克思認為：經

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係，統治者的思想決定被統治者的思想，意識形態決定個人的需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至於何謂社會基礎，何謂上層建築，馬克思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有關文化的歸屬問題，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有學者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的經濟基礎，文化是一種社會生產力，同時是人的意識的外化，因此文化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生產關係（所有制）是社會基礎，文化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受到社會經濟基礎的規範。

### 社會存在着一種持續的文化鬥爭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英國的文化研究主要受到兩種範式的影響：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化主義認為，文化通過人的主觀能动性在生活實踐中產生，強調普通人的文化和文化的日常生活性，反對精英主義文化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結構主義文化理論是從馬克思主義引申出來的一種理論，受到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影響。阿爾都塞認為，社會成員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生活，個體如果不能認同既有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就無法在這個社會生存下去。按照結構主義的文化理



明報月刊

2014年4月



論，社會的意識形態是通過強制性的、無意識的方式，被社會成員所接受。

在霍爾看來，這兩種文化研究範式都存在缺陷。他認為，在社會中始終存在着壓制和反抗兩種對抗力量，大眾文化的生產過程是一種充斥着壓制和反抗的雙向運動。為了更好地迎合資本的最利益，大眾常常成為社會的改革對象。對大眾的再教育和道德化，目的在於使大眾喪失鬥志。所謂「大眾文化變革」，就是把大眾的傳統文化和活動方式邊緣化、逐漸清除出大眾日常生活的過程，用工業文化取代民間文化。工業國家借助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強制推行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迫使民眾或弱小的國家，接受統治階級的文化。在資本主義社會，大眾文化的生產就是要使工人階級的文化從屬於資本主義的文化

和意識形態，改變工人的屬性，也就是使彼此對抗的文化演變成爲相互依賴的文化。在壓制和對抗的雙向運動中，大眾文化也起着調和階級鬥爭的作用。

霍爾認為，大眾文化的構建是基於「大眾力量與權力集團的對立」。在文化研究的實踐中，他引用葛蘭西的霸權理念，構建「文化鬥爭辯證法」。葛蘭西認為，霸權是一個國家對他國擁有較高的控制或影響力量，即一個國家用硬

實力或軟實力迫使他國臣服的能力。葛蘭西把霸權界定爲圍繞領導權和主導力量的爭奪，統治者用霸權來約束大眾，使大眾認同其統治。霍爾認為，在社會中存在着的一種持續的文化鬥爭，試圖肯定或否定這個社會的文化。文化鬥爭通常由統治者的主流文化發起，通過對大眾文化進行破壞或重組，把大眾文化的定義和形式限制在統治者意識形態能夠容忍的範圍之內。這種鬥爭沿着對抗與接受、拒絕與投降的複雜路線前進，使文化領域變成一個持久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沒有一錘定音的勝利，總是有戰略高地被奪取或丟失。大眾有時通過革命，暫時取得統治地位，但始終無法割斷私有制的複雜社會關係，巴黎公社的失敗和蘇聯解體皆是如此。

霍爾的社會研究過份強調文化的作用，忽視了大眾文化的商品因素。他的折衷辦法，最終演變成爲調和主義。資本主義的商業活動總是帶有政治色彩。阿多諾在《啓蒙辯證法》中指出，文化工業是一種「大眾欺騙的啓蒙」。文化工業將大眾熟悉的東西拼湊成爲一種全新的東西，經由適合大眾消費的剪裁，借助商業廣告和政治宣傳，使大眾陷入蒙蔽狀態。大眾文化產品如同其他工業產品一樣，是資本家用以盈利的商品。

麥克盧漢的研究，證實了馬克思有關商品生產的理論。他指出，商品廣告的目的在於謀求社會控制。這種操作本身是一種政治行動，旨在利用大眾的感知定向，強化集中控制的機能，進而獲取超級利潤。私有資本的力量無需對社會負責，他們操縱商品，只要有利可圖，就會繼續操縱下去，任由商品泛濫，在謀求社會控制的同时，他們也必然謀求政治權力。因此，資本活動難免帶有政治色彩。簡而言之，在私有制中，資本綁架了政治，政治綁架了科學，科學綁架了需求，需求綁架了消費，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滿足資本的利潤需求。這正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每一種「新產品」都會產生欺騙和掠奪的潛在力量。

在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不斷爲他者生產「新的需要」，迫使他者爲自己作出犧牲，使他者處於一種依賴地位。每個人都力圖創造出一種支配他者的力量，滿足利己的需要，實現其控制社會的欲望。資本的需要，規範了大眾文化的生產。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化並不是人生存的方式，而只是人生存方式的展示和外化，生活決定文化的形式。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